

# 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的科学性视角

胡正强,王妍妍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为揭示近代报刊诞生以来,媒介批评领域存在的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斗争的表现形态,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梳理分析。分析认为,在纷然杂陈、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场域中,源自科学性视角的媒介批评曾经对新闻传播中张扬伪科学、宣传封建迷信等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发出铿锵有力的批判声音;这种批判声音是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的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

**关键词:**中国;现代媒介;媒介批评;科学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0)01-0111-06

新闻报道讲究新奇,但对新奇的追求必须在科学精神的烛照和规约之下,不能扭曲或异化为猎奇。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工作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真实是新闻界的生命,真实性原则具体表现为新闻工作者在传播活动中所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所报道事实的表述、分析、提炼、概括都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要经得起科学分析和实践检验。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每时每刻都应保持冷静分析的头脑,不能因争抢新闻的轰动性而牺牲科学性,必须从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给受众的思想意识带来积极影响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在纷然杂陈、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场域之中,源自科学性视角的媒介批评曾对新闻传播中张扬伪科学、宣传封建迷信等等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发出铿锵有力的批判声音,对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建构作用。近年来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逐渐有学者涉足其间,但对于从科学观念角度展开的媒介批评

内容,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中国现代科学视角的媒介批评文本并对批评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源自科学性视角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进行一番系统性梳理,以期展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领域中这一非常重要但却被人遗忘的部分。

## 一、对报刊传播迷信观念的批评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现代的报纸,就是人生的地理教科书、人生的历史教科书、社会教科书等等”<sup>[1]</sup>。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学术文化开始重新传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报刊作用甚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是以报刊为中介而入华土。如19世纪后期的《万国公报》就曾介绍过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虽然这些自然科学知识还包裹着一层宗教外衣,“将一切事物,归功于天主,盖其本意也。惟所言万物蕃变之故,多奇凿可听”<sup>[2]</sup>。这对开

收稿日期:2009-08-19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JSDXW001)

作者简介:胡正强(1965-),男,江苏睢宁人,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拓国人眼界确实大有裨益。但中国自古神怪、迷信观念盛行,在新闻报道领域也多有表现。特别是中国近代报刊创办之初,对新闻报道多采取“有闻必录”原则,如《申报》的《本馆告白》中指出:“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致使一些搜神志怪之事不时见诸报端,流风所染,遗毒社会非轻。从科学视角对新闻报道中张扬封建迷信、神怪灵异的现象进行抨击,也就成为媒介批评领域中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知识界渐有觉悟,科学观念日盛,新闻界也常常以真实报道、不欺不妄为号召。如1902年《大公报》创刊伊始,即在《本馆告白》中郑重申明:“本馆以开风气牖民智为主义。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这就是强调新闻报道的真、确、实、正。但观念的变革非一朝一夕之功,现代中国的早期,社会上整体科学观念薄弱,报纸上违反科学、张扬迷信的新闻报道仍然不绝如缕,媒介批评的科学视角也日渐凸显,引人注目。

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包含着众多的迷信成份。近代以降,风气渐开,一些民间信仰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大多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官员仍然安习固常,坚守着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信仰,新闻媒体上常见所谓“毒蛇大王”之类的报道即是一种。《大公报》在《说新闻纸之职分》一文中曾经对此提出批评:

夫以毒蛇为大王,此理果足凭否?倘曰足凭,予从此缄口不复谈论此事,如果不足凭,我辈新闻纸之主持笔政者,遇此等事只可视为无足轻重之列,置之不登可也。即曰有闻必录为新闻纸之体例,登之亦属宜然,惟似须于叙事之外加以按语,以为愚民之棒喝,以合乎开民智之宗旨,乃可不负我新闻纸之职分。若人云亦云,无所发明,有何贵乎有新闻纸,又何以称为新闻纸能开民智,或有谓以毒蛇大王载在本栏祀典者,然我辈议论朝政之新闻纸,岂亦无所辩论,一如愚民之随声附和乎?我辈之争不足贻笑,深恐以素有名誉之新闻纸,一旦于漫不经意之中而伤损其名誉为可惜耳。

在20世纪初年,“有闻必录”报道原则在新闻传播领域还大有市场,但新闻界已经隐约觉察到其弊端和危害之处,只是当时尚无更为有力、更为先进的新闻理论武器传入,因此,《大公报》对毒蛇大王之类新闻报道的批评只能围绕着“新闻纸之职分”

来展开,商兑、建议的温和口气无法形成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驳论,这种媒介批评的力度和效果都受到很大影响。

五四前后,斗转星移,中国的时代和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海外留生成倍增加,西方的科学技术由归国留学生大量输入,国内思想界要求新的科学方法论的诞生,有现实的坚强基础。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极力推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科学观念的巨大功绩,他曾说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日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sup>[31]</sup>。在他及其同道的大力倡导下,“赛先生”此后迅速成为人们观察新闻传播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倡扬科学成为报刊的一时风尚。鲁迅曾对《新潮》杂志在科学知识传播方面的作用给以鼓励和和建议式的评价:

《新潮》海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sup>[41]</sup>。

但中国近现代报刊编辑中旧式文人为数不少,报刊社会新闻中多有荒诞不经、谈狐说鬼之类掺杂其间,这些内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到了人们更为猛烈、尖锐的讨伐。

新闻史学大师戈公振先生曾经概括地批评当时报刊科学观念匮乏令人扼腕,对社会的科学进步和发展不但无所助益,反而多有阻滞的现象:“从科学方面观,可谓最无贡献。因科学之不发达,而迷信遂

益难打破。乱坛可以问政,建醮可以弭兵,野蛮时代之把戏,居然能在二十世纪之新舞台上与人争长短,不可嗤哉?甚至‘天皇圣明’,‘天命所归’之文字,竟能在报纸上发表,此真足悲愤者也<sup>[5]</sup>。1917年秋,上海中华书局陆费逵、俞复等人开设“圣德坛”,组织“上海灵学会”,并从1918年1月起出版《灵学杂志》,公开宣扬“鬼神之说,国家之命遂促”。这些倒行逆施之举不仅受到了进步文化工作者理论上的批驳,而且也在媒介批评领域受到了狙击。

“上海之鬼市”,我未看到过一次;上海的鬼报,我却时常看见。这里所说鬼报,并不是指那报纸是鬼所办的,也不是说那报纸是办给鬼看的。我只觉得在此科学昌明的世界,报纸不尽破除迷信的责任,反而时时“谈神说鬼”,一煽迷信之焰,于是“鬼话”连篇,使愚夫愚妇读之,森森然觉字里行间布满“鬼气”,名为“鬼报”,或者正合于“纪实”的道理<sup>[6]</sup>。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之一就是科学观念的宏扬。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科学观念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但旧的社会观念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们还要挣扎,还不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借尸还魂,向进步观念反扑。从媒介社会责任的角度对报刊传播的内容提出批评,使媒介批评具有了推进社会建设的建设性品质。

## 二、对报刊故意张扬反常现象的批评

1924年7月10日,上海最老的两份报纸,忽然同样登出一段关于驱蚊的笔记。笔记的一段是记小鬼驱蚊:武进一个吕状元未第时,在朱姓家教读,夜不畏蚊。一夕,朱戚某氏宿吕榻,鬼叱为穷教官而去之;又一段是记画圈驱蚊:张天师的女儿,嫁到一个人家做媳妇,夏日在墙壁上画一圈,如碗大,蚊蚋尽自投其中,次晨日出,伊以袖轻拂之,又纷然散去。一稿两投的问题,自然还是小事。而笔记里面所述的两段轶事,都足以增长国人的迷信观念,却偏能同时博得两位大主笔的青睐,则令人嗟叹不已:“此种传说,不但荒谬,而且陈腐,在旧时笔记小说里,不知可以翻得多少,何劳民国十三年之读报者重行录寄,而又何劳大主笔先生为之发排呢?迷信已误尽中国人了!关于蚊蝇的文字,能够从科学上发挥最好,次之从文艺上亦尽有舒写的余地;我愿投稿人和大主

笔今日都从大处着想,勿专作‘姑妄言之妄听之’的想头吧<sup>[7]</sup>!这类题材出现在以教育社会、开启民智自期的新闻纸上,只能说明编辑社会责任感的堕沉和扭曲。

反常是新闻的构成要素。社会新闻中有部分是报道社会和自然界中异常现象的新闻,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报道是新闻纸的份内之事,但中国现代一些报纸在报道这类新闻时,使用一些张皇其辞、似是而非的语言,不仅不能达到传递科学知识、增益见闻的目的,反而造成读者思想和认识上的进一步混乱。著名新闻学者、编辑周孝庵从“精编主义”的角度,对报纸上的一些具有违反科学常识、宣扬迷信倾向的新闻文本进行个案解剖与分析,对一般编辑如何处理这样的新闻具有示范意义。上海某家大报曾经登载了这样两则新闻:

谣传将有鬼敲门

阴历五月十一二三等日

闸北方面,近来忽有一种不可思议之谣言,谓夏历五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入晚后,各处将有鬼敲门,届时须紧闭家门,不可外出,如闻外面有人叫唤,亦不可开门答应,否则必将病毙云云。数日来家传户晓,一般胆小者,顿现恐慌之状态,有不少妇女辈,已预备在该数日中,于晚前买就应用物件,实行关门拒鬼,不再外出。并闻此项谣传,南市等处,亦有发现云。

霹雳一声石狮粉碎

一时又有谣言:天明每闻狮吼

前日午后一时,天气酷热,将浦东陆家宅后面居民俞某住屋顶上长约尺许之石狮子一只击碎,一时观者毕集。据该处乡民云,该石狮子已历多年,近来每至天未明时,恒闻得该石狮吼声,大有跃跃欲活之势,故遭雷击云云。一般迷信者奔走相告,咸惊疑不定。

周孝庵在引述这两条新闻后,加以评述道:“盖近世科学昌明,迷信鬼神之说,渐无立足之余地,报纸应郑重记载,破除迷信,而不可摭拾捕风捉影之谈,大登特登。须知编辑员一时之疏忽,足以贻社会无穷之恶影响,此其一;报纸上所登载者,应为正确之事,今明知其为谣言而登载之,殊与此原则有背,此其二。故以上第一条,绝对不必刊登,第二条则只须刊登石狮触电之事实,‘据该乡民云……’以下之一段,殊属可笑,故亦应割弃。否则,该处居民更将

‘奔走相告,惊疑不定矣’<sup>[8]</sup>。副刊编辑缺乏常识,至可诧异。怪胎闹鬼之事,时见记载;最无根据的剑客侠士的消息,也常有详尽的报告。此外,中医的神效、西人的怪事以及前清笔记中所常有的神怪记载,也无不应有尽有。如1929年4月23日上海《新闻报》即载有《广东新会发现田鱼宝》的消息:

新会为粤中五大名县之一,亦山明水秀之乡,所产甜橙,著名遐迩,顷接该地友人来书言,县城之沙堤桥河中,于四月八日发现田鱼宝一颗,缘是地向为渔夫捕鱼区域,有渔夫名钟濂者,亦属老顾客,是日钟于垂网时,忽见千万鱼虾,群集一处,钟如水兜捕之,鱼虾纷纷远蹿。俄顷又聚,钟甚以为异,乃搜捞其地,得一石,重可十斤,涂去泥污,石色淡青,鳞甲斑斑,绝类金鱼。即怀之归,越日,为某古董家以二十五元易去。事为县教育局得悉,断定是石为宝物,应归公家保存。现正在交涉中。稽考县志,载沙堤桥,某名士曾题之曰紫水渔舟,引为新会八景之一。相传河桥底恒有石像鱼名“田鱼宝”者出现。嗣遭渔夫识破盗去。鱼虾遂渐减少云云。则是石殆为田鱼宝无疑矣。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sup>[9]</sup>。

更为荒谬与可笑的是,对这些违反科学常识的志异式报道却偏偏要涂抹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以达到自欺欺人的阅读效果。郑振铎在《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一文中,引述了上面这条消息后,加以批评道:“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这种消息是无意识的,不足登载的,然而《快活林》的记者居然将它登载了,还要‘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sup>[10]</sup>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报纸编辑却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不理解的好奇神态,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心可议,那只有被嘲笑讥讽的资格了。

中国现代伟大的社会病理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一眼洞穿了这些报刊在科学旗帜下贩卖反科学内容的无聊而可笑的把戏,在《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一文中,不动声色地将几个类似的新闻标题以及报纸的评断置放一处,没有一句评点,却尽情地嘲笑和暴露了其反科学的本质。

毒蛇化鳖——“特治之以备生物学家之研究焉”。

乡妇产蛇——“特识之以供生理学家之参考焉”。

冤鬼索命——“特记之以俟灵魂学家之见教焉”<sup>[11]</sup>。

标题的类似与整饬,产生了额外的框架结构性意义,这种模式框架结构使得批评文本不仅形象具体,简洁生动,而且意蕴深邃,富有意义生成的空间和张力,通过给其添加一个“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这样一个标题,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使其共同的反科学本质特征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和揭露,表面的幽默调侃却产生内在的无比辛辣的讽刺效果,使媒介批评具有了极强的战斗性和艺术性力量。

### 三、追索报刊反科学传播的社会深层原因

1934年5月14日的《大美晚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玄武湖怪人》:

为增游人兴趣起见,不惜巨资。特举办五洲动物园。于去冬托友由南洋群岛及云桂等处各地购办奇异动物甚夥。益增该园风光不少。兹将动物中之特别者分志于次。计三种怪人。(一)小头。姓徐。绰号徐小头。海州产。身长三尺。头小如拳。问其年已卅六岁矣。(二)大头汉。姓唐。绰号大头。又名来发。浙之绍兴产。头大如八斗。状似寿星。其实年方十二岁。(三)半截美人。年二十四岁。扬州产。面发如平常美妇无异。惟无腿。仅有肉足趾两个。此所以成为半截美人<sup>[12]</sup>。

学医出身的鲁迅,对此当然洞若观火,了然于心。他把这段剪报寄给了《论语》编辑陶亢德,并以“中头”之名附注按语如下:“此篇通讯中之所谓‘三种怪人’,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说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sup>[13]</sup>。戏仿地使用“特别”一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该新闻报道扭曲人性的反人类性质。鲁迅先生之所以将此寄给陶亢德,乃是因为《论语》从第四期起,专门增辟了一个栏目《古香斋》,刊载当时各地记述复古迷信等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稿。其实这些表面荒诞不经之事背后的道理并不深奥难懂,只是这些媒体为了行销计,故意神乎其神、张皇其词罢了。

鲁迅的学生、著名副刊编辑家孙伏园对雄鸡生

蛋类的志异式新闻结尾,一般要冠上“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一句,更是著文痛批道:“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真要求科学家去研究,不过是志异式新闻的一种结尾语,仿佛是‘须至志异式新闻者!何以见得呢?因为在远没有科学家的古代,这种志异式的文字也早已有了,内容完全与现在的志异式新闻一样,只是结尾没有一句‘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现在既有了科学家,作者明知这些怪事与科学相冲突,特此反照一笔罢了”<sup>[13]</sup>。人类有好奇的心理,那愚鲁的固能一听见谣言而深信不疑,并且连自身也不期然而然地卷入传播谣言的漩涡,成为热心传播谣言的分子。就是那聪明人,也因为好奇的缘故,决不愿意将这谣言细心考虑或调查一番,使之化为平淡无奇,以为一经揭穿便索然寡味,反不如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更有意思了。

为什么中国报纸上会出现这些志异式新闻?孙伏园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道:中国初有报纸之时,人们还没有养成看报纸的习惯,加之那时的《申报》所谓言论也不过是劝人戒吸鸦片等一类。谁喜欢听这种枯燥无味的说教?于是志异式的新闻便应运而生了。的确有许多人,因为要看“雄鸡生蛋”的缘故,无意中看到了世界大势,因而逐渐超脱“雄鸡生蛋”这一级,变成报纸之正式的读者了。而在报纸的编辑者这一方面,既用“雄鸡生蛋”将读者引诱上了正轨,又应将这卑陋的药饵式的工具抛弃到九霄云外。但现在能够抛弃这卑陋手段的报纸,实在是很少很少,并且变本加厉,形成了一个“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的模式化结尾。

在他们的意思,以为世界上有科学家,是专备研究“雄鸡生蛋”、“母猪三足”等等用的。其实科学家如果要来研究你们这些古怪玩意儿,世界上早就没有科学家了。神飞先生在《游三贝子花园杂感》中有一句话说得真刻:“你们都回去,把四脚猪看明白了,再来看三脚猪”。不错,如果把普遍的学问都研究好了,喜欢看看这些古怪东西,也并不是一定不许他们。不过待一明白了四脚猪,对于三脚猪便决不会看得上眼,那时早已知道这只是特殊的事情,一种生理上的残废罢了。报纸上常有“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这句话,果不当他是刻板的结尾语,却是确有这个意思的,那便越显得这个民族内没有真的科学家<sup>[13]</sup>。因此,所谓的“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孙

伏园戏谑地说:最好是改作“特志之以供野蛮民族学者之研究”或“特志之以供疯狂心理学者之研究”更为恰当!一语道破所谓“科学”的反科学本质。

大众传媒以文本的形式为受众接受。表面上看,传媒的文本只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实,大众传媒不只是文本,它还是一个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结成多重关系的社会机构。传媒的信息服务功能不可否认,但这种服务不能妨碍媒介所有者意识形态的表达需要。“报纸若在少数资本家的独占之下,所谓言论自由,便将无所用之,资本家决不许有与其利益相反的议论;在这里,或者废除评论,完全成为一种商业机关,表示其所谓中正公平的态度,否则,或竟发挥其反动的言论,藉著独占的劳力而左右一切”<sup>[14]</sup>。很多看似平常的新闻现象,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所察觉的意识形态。新闻传播在报道封建迷信、反科学内容的时候,往往还隐藏着转移人们视线、消弭人们对现实社会不满情绪的“安全阀”作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众传媒的批判学派曾经在讨论文化工业命题的时候对此予以揭露和批判。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在开展媒介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之时,就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并且发出了与欧洲批判学派殊途同归的声音。谢六逸曾经不满地指责报纸不敢直面社会的黑暗:“看报纸的人的头脑浸润在战争、奸杀、盗窃、娼寮、酒食、冠盖往来、买办暴富里面。一切受苦受难之声音,是永远和中国的阅报者绝缘的”<sup>[11]</sup>。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一种“帮闲法”而已,帮忙、帮凶和帮闲有时候并没有多少质的分别;张扬封建迷信、伪科学的新闻报道,往往抓住新奇、反常的某一点大做文章,仿佛趣味横生,至少也无伤大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与帮凶无异;因为用这些海式有趣的内容填塞读者的大脑,只会使严肃的内容减少力量:“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sup>[15]</sup>。而这正是这些帮闲性报刊的可耻、可恶与可怕之处。对新闻传媒及其传播现象作出这样的认知和解读,确实给人耳目一新、入骨见髓之感,有助于揭穿传媒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的社会公器的神话,与后来的意识形态分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 四、结 语

从近代报刊诞生以来,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

的较量始终是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一条基本线索。两者的交锋不仅表现在报刊传播的内容上,也表现在媒介批评领域。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对以灵学会为代表的封建迷信与伪科学势力的声讨和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长达20年的围绕人体特异功能、风水文化的拉锯式持久战,是又一次高潮。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匮乏,也证明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但在中国社会中科学教育和科学启蒙仍然还是一项十分必要、格外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大众传媒承担着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的作用,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必须秉持客观、认真、负责的精神,高举理性、科学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迷信和伪科学。科学只有在与迷信的斗争中才能建立自己的尊崇地位,而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里广泛存在,媒介批评亦概莫能外!

#### 参考文献:

- [1] 谢六逸. 谢六逸文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 [2] 王林. 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 [M].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 [3] 陈独秀. 独秀文存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6] 邵力子. 上海之鬼报 [N]. 民国日报, 1924-06-29.
- [7] 邵力子. 驱蚊的笔记 [N]. 民国日报, 1924-07-18.
- [8] 周孝庵. 新闻学上之精编主义 [G]//黄天鹏. 新闻学刊全集. 上海:上海光新书局, 1930.
- [9] 谭观成. 广东新会发现田鱼宝 [N]. 新闻报, 1929-04-23(8).
- [10] 郑振铎. 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 [N]. 文学周报, 1929-04-23(1).
- [11] 鲁迅. 鲁迅全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2] 佚名. 玄武湖怪人 [N]. 大美晚报, 1934-05-14(2).
- [13] 孙伏园. 特志之以供科学界之研究 [N]. 晨报, 1922-08-06(8).
- [14] 樊仲云. 中国新闻事业的危机 [G]//李锦华, 李仲诚. 新闻言论集. 广州:新启明印务有限公司, 1932.
- [15] 鲁迅. 鲁迅全集:第5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 media criticism

HU Zheng-qiang, WANG Yan-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Jiangsu,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newspapers, there is always consist of science and feudal superstition and pseudo-science in the field of media criticism. The authors use content analysis to show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Chinese modern media criticism by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The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divergent voices of the Chinese modern media criticism field,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f media criticism has made a strong and sonorous criticism to the act of promoting pseudo-science and feudal superstition in the news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is criticism has played a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press.

**Key words:** China; modern media; media criticism; scientific perspective